

作者力作《读不懂农民 读不懂中国》之续篇

不深读三农 就读不懂中国

●中国还是一个二元经济社会结构吗？

●民以就业为天，退一步，就业机会海阔天空！

温家宝总理说：“同学们无论学什么专业，都要懂得农村，了解农民。在中国不懂农村和农民就不懂中国国情。”

——在中国人民大学五四青年节上的讲话

汤安中◎著



中国经济出版社
CHINA ECONOMIC PUBLISHING HOUSE

作者力作《读不懂农民 读不懂中国》之续篇

不深读三农 就读不懂中国

- 中国还是一个二元经济社会结构吗？
- 民以就业为天，退一步就业机会海阔天空！

汤安中◎著

III



中国经济出版社
CHINA ECONOMIC PUBLISHING HOUSE

中国·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不深读三农就读不懂中国/汤安中著

北京: 中国经济出版社, 2009. 12

ISBN 978 - 7 - 5017 - 9500 - 0

I. 不… II. 汤… III. ①农业经济—研究—中国 ②农村经济—研究—中国 ③农民—问题—研究—中国 IV. F32 D422. 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65994 号

责任编辑 刘建生 (电话: 010 - 68308643)

责任印制 张江虹

封面设计 清水设计工作室

出版发行 中国经济出版社

印刷者 北京市地矿印刷厂

经销者 各地新华书店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印 张 21

字 数 330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12 月第 1 次

印 数 1 - 5000 册

书 号 ISBN 978 - 7 - 5017 - 9500 - 0/C · 19

定 价 36.00 元

中国经济出版社 网址 www.economyph.com 社址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北街 3 号 邮编 100037

本版图书如存在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发行中心联系调换(联系电话: 010 - 68319116)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举报电话: 010 - 68359418 010 - 68319282)

国家版权局反盗版举报中心(举报电话: 12390)

服务热线: 010 - 68344225 88386794

辨代序

——道可道，非常道。

“我们读懂‘中国’这本书了吗？”

“当然读懂了，中国人岂能读不懂自己的国家？”

“未必吧。”

亲爱的读者，且听笔者慢慢道来怎样？

世界历史告诉我们，古代四大文明的埃及文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及印度文明均早已被湮埋在历史尘埃中，唯独中国文明延续了下来，中国可以为拥有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而自豪。这表明，我们社会的继承性远大于创新性。社会的惯性运动达数千年之久。但物极必反，中国社会也不能例外。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60年，中国社会犹如一座沉默了数千年的火山突然爆发，成为一座异常活跃的活火山。似乎厌倦了“继承”，在前30年中，在革命的口号下，一切继承均被视为“反动”，人们的个性之光全都被抹杀，共产风扫荡了神州大地。这也许就是对数千年之久的社会惯性的一种“本能”的反叛。而后30年的改革开放，则又是对前30年经济社会运动的反叛！否定之否定，但不是回到原点。

社会发生了如此大的沧海桑田的变化！60年对于数千年来说，只是一瞬间，足见它的变化之剧烈！正因为如此，它给我们的思想观念、理论诠释抛下了一大堆疑问与理论识辩。于是产生一个共同的问题：“为什么中国总也读不懂？为什么现今会出现一系列枚不胜举的争论，谁也不能说服对方？”

——户籍政策怎么啦？

社科院蔡昉所长提出了“户籍利益剥离”论，引发了对这个老问题的热议。议者观点千差万别。一些学者认为户籍制是计划经济的产物，它严重阻碍了社会资源在全社会范围内的优化配置；另有学者认为它维持了对农民的剥夺，它是许多不公平制度的保护神，必须取消现代的户籍制。而反对

者则认为,现行的户籍制是保证社会安全运行的安全阀,相对而言,利大于弊,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不能取消;还有人认为,剥离了户籍的利益,必会造成大批农民拥入城市,造成“贫困在空间的平面转移”,形成一个个城市贫民窟,这将会形成一种畸形社会。处于实践第一线的县(市)决策者,多持反对观点。十个县(市)可能有十种理由。一些“海归”派则俨然以大学者身份大谈发达国家的“先进”户籍制,对于中国至今仍维持这种“落后”的户籍制实有些不屑一顾。总之,只要我们稍稍注意一下争论观点,就会使我们越想搞清楚却越糊涂。户籍制虽不是《物权法》,更不是《宪法》,但它的去废却引发了如此多的尖锐对立的观点,我们连它都读不懂,怎么能说我们读懂中国了呢?

——小产权房又怎么啦?

小产权房自房地产热以来,也随之升温,最近央视专门就深圳小产权房是否可确证又引发了新一轮争论。一方认为,在农村中擅自兴建出卖房屋,必会占用大量耕地,使18亿亩耕地红线不保。所以,国土局将擅自兴建小产权房作为非法处理。然而,小产权房却是屡禁屡建,犹如野草烧了又发,再烧再发。一些城市,几乎达到了该市现有房产的20%,深圳达到了49%,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法不责众”?也许是一个说法。但一些学者对这些乱象则质疑道:“是《物权法》大还是《国土法》大?”另有些学者则提出,房产是今天中国经济水平下的一项重要个人资产,为什么城里人房屋可以参与市场交易成为“有产者”,而农民的房屋却不能?而近据央视报道,四川城市居民,去受灾农村与无力建房农民利用其宅基地合建住房,各分一半,又怎么说呢?总之,对于小产权房问题,我们现在仍然只是“糊涂对糊涂”!

——扩大内需究竟是权宜之计还是历史的必然?内外需在今后10年、20年后的变化规律将怎样?

自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我国外贸出口犹如一艘满帆航船“直挂云帆济沧海”。各个加工企业无论是国内的还是国外的,均向中国沿海抢挤地盘。2008年的世界经济危机如一股太平洋飓风带着恶浪突然扑面而来,一些航船顿时淹没,一些较坚实的还以为可以在5、6月恶浪过后恢复过来,但浪恶仍然一个接一个,除极少数企业外,大多数企业都被迫转向内需,或迁或转产或关门。现在有人要问,如果没有这场经济危机的风暴,中国的外向经济究竟还能继续多久?“转承世界产业的历史时间表还有多长”?如果有

人说这场风暴即使不来,中国经济也迟早要转向内需,那么为什么我们那么多经济学家及聪明的企业家都没有察觉?企业都不早些迁到中、西部?再者,这个扩大内需究竟是一项权宜之计呢还是应该作为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国策?它同世界经济一体化趋势相冲突吗?我们都搞清了没有呢?

——医疗资源分配不公,将怎样解决?

多数人认为要数十年后才有可能。然而有趣的是,陕西神木县的“全民免费医疗”恰如一石激起千层浪,引发各方争议。有人认为,神木能做到,别的县也能做到。但是人们并不知道神木县是一个财税大县,全县40万人,GDP达到290亿元,地方可支配财政收入为17亿元,人均4250元,而每年医疗费支出需1.2亿~1.4亿元,只占财政支出的7%~8%。但这个1.2亿~1.4亿元,对于可支配财政收入不足1亿元的县,则是绝不敢想象的。然而问题又来了,在中国2000多个县(市)中就没有一个县(市)的可支配财政收入超过17亿元的吗?如果你去查阅一下沿海各省的统计年鉴就会发现,大有县在,神木并不排在前列!它们为什么不能做到“全民免费医疗呢”?稍差一点的县(市)为何不能做到“半费”医疗呢?是不能抑或不为?为什么许多地方在市政容貌工程上像花花公子那样大把大把烧钱,豪气十足,要多花点钱在公众医疗上就十分小气?我们总将许多事归之为“政绩工程”,但为什么各省在下达各县(市)的政绩工程时不将医疗公平列入进去呢?列进去能管用吗?

——贫富差距究竟是缩小了还是扩大了?推动变化的机理是什么?

国内学者对贫富差距作了大量研究,采用的多是基尼系数对比方法,但所得结论之差异甚大,使决策者无所适从!

在缩小东西部贫富差距上,我们确实曾作了许多努力,也取得不少成绩。但是总不理想,似乎是事倍功半。对此某些学者从社会成本视角主张放弃西部的工业化,认为那个社会成本太高,完全不值,让它保持农业区,倒可增加中国的农业面积,更何况西部地区是中国的上游地区,更多的绿色可供给中国更多的水资源。然而,一个纯农业区,在现代社会中将永远是一个经济文化科技的弱势区,那么将如何实现东西部的平衡发展呢?另有些学者从经济社会惯性运动理论出发,认为经济社会运动不是人可以命令的,说让它停就停,说要它快就快,东部之所以仍保持高速,是东部地区的潜在能量远未耗尽,还在喷发,中、西部地区仍未摆脱路径的依赖,还有许多惰性因

素未克服,积极向上的因素仍不足抵消、克服原有的消极因素与惰性的惯性。是这样吗?如果是,那么这些消极因素又是什么?(经济、文化、民族、行政)惰性的惯性又是怎样形成的?我们搞清了吗?

在缩小贫富差距的议论中,我们发现,总是伴随着一个效率与公平的争议。都说要兼顾,但究竟哪个优先?一些学者指出,在废除计划经济初期,因为效率太低了,应该鼓励效率优先,现今,应该是公平优先,否则贫富差距将会越来越大,以致积重难返。有的学者还从和谐发展谈公平与效率,认为只有分配公平了,才能取得和谐,社会和谐了,经济才能快速发展。然而问题是,现今发展不能再单靠国家,而要大力发展民间资本,而民间资本必须遵循利润原则。在贫困的中、西部地区,因为交通十分不便,因为主要消费市场在远离中、西部的东部,所以生产成本与营销成本远高于东部,因此,资本总是不愿“嫁”到中、西部,致使它们的人均动态资本拥有量远低于东部,在收入上怎么也赶不上来。于是,许多经济欠发达县采取“只准销售本地产品”,甚至向干部及教师下达消费本地产的烟、酒等指标。他们明知违背国家的法律,但还是做了。若不准他们做,财政捆死,连教师、干部的工资都难保按时发放,又何谈与东部发达县的经济水平拉平呢?

——行政权力怎么会产生权力产权权益的?

市、县本来都是行政区划,各市、县政府只是贯彻执行中央、省的政策方针、维持公众社会秩序的行政机关,但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这个上层建筑的行政权力却拥有各自的“权力产权权益”,这是怎么回事呢?

为了本市、县的利益,在招商引资时,各市、县都或明或暗地各自施展自己的本领拉客户,不惜压低地价,税收回扣,大放贷款。上海为扩大港口吞吐量,宁可将港口选建在条件远比相邻的宁波北仑港差的本市,投资也更大。难道不都是为共同的社会主义事业吗?为何偏要就劣而不就优呢?为何国家不干预?上海、杭州为了使市区内空气更宜于本市居民居住,这两市均要求工厂外迁,但要它们迁到属于本市辖的郊区县,以防止“肥水”(税收、就业岗位)外流!这又是什么作祟呢?仅仅是为了政绩吗?不是,众所周知,财税多的市、县干部的工资福利就高,同样是一名行政科长,苏南几个经济发达市工资比苏北的欠发达县的高出10倍之多,东莞一名镇党委书记的年收入最高的可超过百万元。这里存在一个事实上的权力权益。神木县这次“全民免费医疗”,只限于本县行政区划内的农民,而与神木县城仅一条小

路之隔的府谷县农民却无权享受,为什么?低保已在全国各市、县普遍实行了,有的市、县每人每月只有150元,而财政富裕县却可从政府每月领到四五百元之多。上海、北京、广州、武汉等大城市的居民子女高考录取分为什么可以比非本市的低许多?凡此种种权力产权的衍生权益究竟应如何解释呢?

马克思曾指出:“每人以物的形式占有社会权力。如果你从物那里夺去这个社会的权力,那你必须赋予人以支配人的这种权力。”^①然而,我们的行政权力,我们的市、县长,他们并不是“以物的形式占有社会权力”,而是为了管理社会的需要,怎么也占有这种“社会权力”并衍生出“权力产权权益”?连他所管辖的臣民也受其惠,又是怎么回事?这与中国的特色社会主义有关吗?与中国是一个农民大国有关吗?与中国的跳跃式的社会转型有关吗?我们都读懂了没有?

——为什么于丹《〈论语〉心得》竟能在中国刮起一股巨大的“于旋风”?

答曰:“这不仅因为她的视角独特,让人们以欢快的心情去读《论语》,还因为她的语言精炼、文笔优美。”不错。有学者还认为《论语》这部名著的内在魅力是更重要的原因。它以极其精辟的语言说出了中国人心里想说的话,与今天中国人的心态与观念非常合拍,于是引起了共振。这是最根本的一点。但是很少有人关注下面这个基本事实:它诞生于二千多年前的农耕社会,更没人再追问一下,为什么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写出的东西,会在21世纪中国人的心中引起如此大的反响,如此大的共振?笔者苦思冥想之后终于悟出了其中的奥秘,因为我们的“骨子”里至今仍未彻底清除农耕社会的“铭记”,其实向上追溯三代,“我们都是乡下人”,所以,孔老夫子在二千多年前那个农耕社会说的话,自然听之仍甚感亲切、中肯。可见,今天的中国人虽已进入了21世纪,但我们的思想、观念、行为还经常受到“乡下人”的这个潜意识程度不同的影响,因此,我们若不首先懂我们“自己”——“三农”——又怎能真正读懂中国呢?

其实,读不懂的“中国的问题”还甚多。我们的城市建设为何都似一个模子刻出来的?同构现象为何如此普遍?为什么中国的公民权常被公权侵犯?民告官为什么总是99.9%失败?为什么官员的个人财产总也公布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46[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104.

了？为什么看来十分简单的公车改革如此难以落实？为什么春节期间的“民工潮”总是年复一年“涨落”？何时才会消失？为什么中央提出的“重中之重”在许多地方总是走样，难以落实？

.....

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真正的难题是，为什么“中国”这本书这么难读，总也读不懂，原因究竟何在？

笔者经过久久苦思冥想，思路终于日渐清晰。原来是我们忽视了农民、忽视了“三农”，总以为在现代化的大发展格局下，农民这颗棋子已无足轻重了，可以不予考虑。对吗？不对。我们上文提到的种种问题，有哪一个不关联到“农民”、关联到“三农”问题呢？

历来的观点认为，中国是一个二元经济社会：一个是高速运转着的现代社会，另一个是运转滞缓的农耕社会，二者均根据自己的社会特质与建构、机理运转，似乎各不相干。上海昂贵的F1赛车、浦东与黄浦江岸边的国际银行群，上证、深证交易所，北京高耸入云的水泥森林、豪华的飞机场、数字港口、数字城市等，按照二元论的说法，它们对于中国西部农民都是“天方夜谭”，他们看不懂也不想懂。他们还只习惯一锄一锄地锄草、松土，一步一个脚印将肥料挑到田里，再用扁担将粮食收回家，在熟人圈中日复一日地过着几乎可以复制的生活。他们总以为大都市离僻野乡村越来越远。据此有些学者指出，在过去，农民依靠农产品同城市的工业品相交换，以求沟通。现在这条渠道越来越窄，因为农副产品所占城市消费的比重越来越低，正如恩格尔系数所揭示的那样。基于以上差异，一些学者提出，城乡的互动性越来越弱，有的只是城市对农村强信息，农乡返回的却是弱信息，信息既无法对流，城乡差距必然扩大化。正是基于这种二元论的认识，“农民问题、‘三农’问题”越来越远离生活、工作在城市人们的视线，越来越被城里人忽视。在讨论“中国问题”时，关于它的声音，越来越微小，越来越不被注意。在那些专家所建立的“模式”中，根本就没有“农民”元素的影子。我们总也读不懂中国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我们总也跳不出这个从国外教科书中搬过来的二元论，这是一个已过时了的二元论，不符合中国今天的国情。

中国自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期，在农民市场潮的冲击洗礼下，原有的二元经济社会结构已破裂，西方经济学中的那种二元经济社会结构不复存在了。现今的中国经济社会结构已成为“2+1”的混合结构：一个是高度现

代化的经济社会,一个是仍相当落后的农村经济社会,现在又出现了一个高速流动于上述两种经济社会之间的混合型经济社会,他们是由农民工、自主创业的小商贩、小业主及新成长起来的老板群而合成。加上他们的子女,人数有4亿~5亿之多。这个4亿~5亿之多的新群落,在经济生活方面,对农村来说,是“有钱人”,对现代城市居民来说,除老板、企业家外,他们大多是城市中的中下层群体。正是由于他们的存在,由于他们带着劳动力、技术、新知识、新观念、新资本在城乡间高度流动,城市中的几乎所有领域都有他们活动的身影。他们在城市活动的资历各不相同,从初来的几个月、一年、数年到数十年,如果要查“三代”,那么可以用歌唱演员雪村的一句话表述:“往上推三辈,都是乡下人”!因此,他们的思想、观念、习惯、“家谱”都可以从“乡下人”那里查到。中国城市的同构现象,就是小农意识的“种田不用学、人家咋干我咋干”的城市翻版!这个由数亿人构建的混合元,它的边界十分模糊,由于它的不确定性来自多维因素,稳定态极低,因而它又是中国社会变动的最积极、最具活力的“酵母”。一切大的变动,都可以从中找到解释。这种由二元的经济社会向“2+1”的混合结构的整体转型,各地并非步调完全一致,转型的速度、广度与深度以及方式,各地均不同。发达地区快、广、深,而西部则反之,有些落后地区的农民虽进了城市,但尚未产生回乡的创业效应,农村依然是过去的农村,小县城还是一盏灯可照亮全城的东西城墙,没有自己的工业,有的也只是手工作坊式的工业。但它们的农民却仍可以给城市带来许多欢乐、麻烦与变数。至于发达地区,这个混合体已不仅使他们的老家“骚动不安”,更使城市“动荡不安”,到处有他们在做事、说话、赚钱,有的“乡下人”已成为城市中的白领、老板,还雇起了城里人替他们打工,已难分清谁是乡下人、谁是城里人。但这些白领、这些老板就在10年前或5年前还是地道的乡下人,还是农民!你想要深刻认识中国,离开了农民、离开了“三农”、离开了这个在全社会范围内正在做相态运动的“2+1”的混合型,根本是不可能的。

综上所述,我们发现,总也说不清的城市户籍问题,归根结底是农民问题,是“三农”问题;那个十分敏感的小产权房问题,牵涉最深的还是农民利益问题,还是“三农”问题;所谓扩大内需,要建立起内外并重且可以及时转换的经济体制,根本问题还在“三农”;医疗公平问题实际上是农民享受医疗的公平问题;教育资源的共享就是农民怎样参与的教育共享问题;公权对私

权的侵犯问题是如何防止减少地方基层政府官员对弱势农民群体的侵犯问题;一些地方各种自定法规圈占农民土地问题还是一个太弱的农民群体如何应对强势的地方基层的强势行政权力问题;城市化问题归根结底是怎样使农民变成城市居民问题;贫富差距问题的解决从根本上说是怎样加快提高农民的智力与收入问题;中国水荒问题的大头仍在“源头”的“三农”;中国人的素质现代化最大的难题,是占人口60%以上的农民素质问题;所谓确保“粮食安全”,实际上无法离开“三农”的安全;就业的最根本的问题仍是农民的就业问题;中国的中小企业问题之所以复杂难以解决,是因为中小企业绝大多数是从农村的“草根”经济转升上来的,它同“三农”存在多维的天生的联系,解决不好与“三农”的联动,单论中小企业难以说清;中国的二元经济社会结构向三元混合动态经济社会的转化,将决定中国未来二三十年的社会命运,这种转化,归根结底又是中国农民的转化问题……

以上种种理由说明,我们之所以总也读不懂中国的根本原因,只是因为我们将自己的视线只停留在城市里,只倾听城市人的声音,更何况我们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都在城里,有话语权的人都生活在城里、工作在城里、利益在城里。而来自“三农”的各种信息,自然十分微弱,被漠然搁置一边很自然。所以要真正读懂中国这本书,就必须沉下心来,戒除浮躁,去深读中国的“三农”。至少在20年内必须如此。

1997年,笔者曾根据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改革开放“初创”期的中国发生的种种难以理解的问题,写过一本题为《读不懂农民 读不懂中国》,引起各方强烈反响。事过10年,中国的变化如此之大,尤其是中国又遭遇亚洲金融危机,又加入WTO,现又遇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世界经济危机,在历史长河的这段河道中,恶浪竟是如此汹涌多险!若仍根据过去的情景读中国,岂不成了“刻舟求剑”的笑话了!所以,本书实际上是1997年《读不懂农民 读不懂中国》一书的续篇。我以为,再过10年,还应该再有一个续篇,因为,中国的“三农”问题对中国社会变迁的巨大决定作用20年内还不会消失!中国就是中国,真可谓:道可道,非常道!

序言本应从简,但感慨太多,无法草草停笔,请多谅解。

附:90年代初的一个传闻甚广的小故事

20世纪90年代初,因“六四事件”闹得天下不安,不仅中国极为关注自己国家的命运,就连美国也极端关注。据传经国务院同意,当时美国派来了

一个调查组,在山东恒台(农业县)蹲点 40 余天,经过十分缜密的准备,以完全客观的态度调查访问乡村干部、男女老少村民,最后得出了一个 20 个字的结论,就是:共产党还能继续维持很久,不会形成全社会动乱。

美国人真有意思。

辩证代序外加一序

1997年出版的《读不懂农民 读不懂中国》是本人对改革开放20年从一个基本侧面所进行反思与展望。经过时间与实践的考验证明,基本观点不仅当时是正确的,现在看来也是正确的。该书的结论至今仍被理论界与政界经常引用。

今天,已是2009年,虽过去10年,人世间的事情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时过境迁,颇有沧海桑田之感。因此,需要对这10年来的改革开放进行新的反思与展望,故写了这本书《不深读“三农”就读不懂中国》。

众所周知,任何一种理论思想的确立,都有一个形成、发育、成长、成熟的过程。只有了解它的全过程,才不致于断章取义与误读。因此,我又将《读不懂农民 读不懂中国》一书的序再录于本书以求系统化,深化本书的思想。好在该序写得生动活泼,无官腔,无空话,大家都愿读,尤其大学生、硕博这个年轻群体,读后拍手叫好。今天,当您也来读它,定然会如此。您信不?

《读不懂农民 读不懂中国》一书之序

读不懂农民,怎能读懂中国——

中国农民的今天与明天,激荡着所有中国人的生活进程——

中国农民一旦在东方腾起,将从根本上改变世界格局——

您若不信,且听情感激越的论辩——

苏轼有诗曰:“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此诗耐人寻味,富有哲理。笔者通过对中国社会10余年的研究发现,中国农民犹“春江之鸭”,当今中国的每次大变革,总是农民先知。何奇之也!

改革开放的历史性进程尚在酝酿之时,安徽小岗村农民却先知“春江”之水已暖,遂悄悄地在“水下”欢乐地划动着双脚,数声轻快的叫声顿时惊动了中国的9亿“春江之鸭”,于是一群群争先恐后地扑向了春江,一时生机盎然。然而,当时的《人民日报》还在头版头条发表了一篇“读者来信”,责问道:“这不是包产到户的单干吗?”多严厉的责问!人们无不从小岗村农民深感惴惴不安,不知又将遭何等横祸。难道农民错了吗?否!事实胜于雄辩,改革开放之春的信息确确实实是他们先知了。可惊奇的是,农民们既无高深理论,又无专人给他们传递机密,为何这些农民却“先知”了?奇哉!奇哉!

当许多理论工作者(当然也包括笔者)还在疾声呼吁要拒一切非国有经济于“国门”之外时,党中央已酝酿成熟了“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宏大构思。温州的农民却又先于机关干部,先于理论工作者,感知“春江”水已暖近,遂大胆地创办起了一批批个体、私人经济,10万销售大军踏遍中国的千山万水,10万家庭工业与私人企业如雨后春笋奋力冒出久冻的土地。温州这块老革命根据地的农民,几乎在没有任何国家资金物力的援助下,在人均只有三分地的条件下,在全国率先脱贫,全区农民的富裕程度一直居全国前列。温州农民的行动,唤醒了千百万农民,使他们勇敢地踏破“篱笆墙”,加入这个曾被严厉批判过的所谓的“资本主义”行列。至1996年6月,全国的个体及私营工商业户已发展到2544.9万户,注册资金达5014亿元,为社会提供了5558.9万个就业岗位,上缴财政税收逾700亿元。在相当多的地方已成为该地方新的经济增长点,获得了社会的赞誉。农民为何又是先于城市的人们知晓“春江”之水已暖?这不值得我们深思吗?这是偶然巧合?还是其中有着深奥之理?

再以中国的乡镇企业观之,又是一谜!它的超乎常规的发展,令世界为之惊奇不已。国外报纸称之为中国的“秘密武器”。当今的乡镇企业已发展到1800多万个,就业人员1.3亿,1996年全国乡及乡以上工业增加值为1.9万亿元,而乡镇企业达1.77万亿元,上缴税收逾2400亿元,占全国工商税收总额的近40%^①。乡镇企业已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一大支柱。然而,当我们回首20世纪80年代初,情况又如何呢?农民用自己省吃俭用的钱创办起乡

^① 乡镇企业小资料[N]. 经济日报 1997-1-7.

镇企业时,却总是受到各方歧视,他们不得不“踏遍千山万水,历经千辛万苦,说尽千言万语”,才为自己开创了一条艰难之路。可是我们的一些人对乡镇企业却无法理解,指责它们的产品全是假冒伪劣,甚至指责“乡镇企业在为和平演变铺平道路”。有的人为此提出要强行砍去1/3的乡镇企业。这大概就是“理论是灰色的,生活之树常青”吧!然而更令我们这些理论工作者困惑不解的是,为何农民的正确行动与创造总是出乎我们意料呢?连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也感到意外。他说:“农村改革中,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的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突然冒出搞多种行业,搞商品经济,搞各种小型企业,异军突起。”^①为何“春江水暖”又是中国农民先知?又是巧合吗?

当我们将历史时空焦距再往近收,又看到另一个不可理解的现象。这一组镜头是千百个理论讨论会的热烈争论场面:“计划经济是否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根本标志?”“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能否成立?”“计划与市场是六四开或三七开?”等等。而另一组镜头却是,亿万农民以铺天盖地之势扑向全国所有铁路、公路,涌向沿海、港口,涌向大、小开发区,涌向大、中城市,涌向全国一切市场,熙熙攘攘,到处人满为患。一时引起了城里人的惊慌。最初,人们将农民闯市场称为“盲流”,大幅的“盲流”照片占据了一个又一个报刊版面,有的为了引起轰动效应,将农民等待火车的狼狈艰辛场面的照片刊登在第一版上,电视上更是屡屡予以曝光。后来,人们发现称“盲流”十分不公正,也不恰当,遂改称为一个比较雅致而时髦的称谓“民工潮”。说实在的,农民进城所引发的新鲜事实在太多太多,于是,某些理论界人士提出了一个新学科,称之为“民工经济学”。但另一些理论家总觉“民工”不确切,于是又引进西方经济学中的“农村劳动力转移”。这些称呼与概念究竟如何可以争论下去。值得惊奇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构思在当时尚是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脑海中的设想,并未公之于世,而亿万农民却先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春江”之水已暖,竟然冒祖训之大不韪,离乡离土成群结队铺天盖地地扑向全国南北东西,一时闹得神州四面八方都是农民的身影。哪里有市场,哪里就有农民,小平与中国农民之间,真可谓心有灵犀一点通!善哉!善哉!

^① 邓小平. 邓小平文选[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庆幸之余,使笔者感到大惑不解的是,“春江水暖”为什么总是农民先知?事物既然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复,其中有其必然性。故笔者贸然以《读不懂农民 读不懂中国》命名本书。此为其一。

其二,笔者通过多年研究还发现,中国的几乎所有重大问题与决策,都可归结为农民问题。农民方面的问题解决了,中国某个问题的最后一个“扣”也就解开了。

计划生育是中国的难题之一,而计划生育的“大头”在农民,最大的难点也在农民,只要真正解决了农民的计划生育,中国的计划生育也就解决了。所以,中国的计划生育问题归根结底是农民问题。可见,必须首先读懂农民的计划生育,才能读懂中国的计划生育。

共同富裕是我们社会主义的基本纲领。那么,怎样才能缩小贫富差距达到共同富裕呢?缩小谁与谁的差距呢?人们总讲缩小东西部经济差距,但归根结底是缩小城市居民与农民的差距,最突出、最紧迫的自然是在6500万(据说1996年底为5800万)尚处于绝对贫困状态的农民与全国人民的差距。所谓达到小康水平,归根结底也就是农民的小康问题,因为他们是经济收入最低的一个阶层。如果最低的这个阶层都达到了小康,那么,还有哪个阶层不富裕呢?问题的根本仍在农民。所以,我们必须深入地了解农民,真正读懂农民这篇奇丽的文章,才能最后读懂中国的共同富裕、中国的小康。只读懂城里人,是读不懂中国的共同富裕之路的。

中国的教育问题、中国的扫盲问题,归根结底仍是农民问题。

城里人在“鼠末牛初”之年,均喜气洋洋地谈论物价“便宜了”、“大米便宜了”、“小麦便宜了”、“肉便宜了”、“禽蛋便宜了”、“鱼便宜了”、“菜便宜了”。但是,一般人均没有问一下,这些主食及副食品“怎样会便宜了”。实际上除了中央宏观调控的成功之外,更直接的原因是农民使它们便宜了,是农民艰苦奋斗,使大灾年变为丰收年,使农民的供给大大增加了。由此可见,物价稳定又离不开农民这个话题。

世界各国一直对中国的经济高速增长奇迹不理解,尤其是在国有企业出现50%以上亏损面的情况下,中国的GDP却始终保持10%以上的高增长,则更不理解。因为外国人根本读不懂中国农民,以为农民历来就只是一个听使唤的被支配、被奴役的阶级,根本不屑一顾。然而在中国,在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农民却是一个十分奇异的阶级,农民们居然自己当了工厂主,创

办了一批又一批属于农民自己的企业,我们称之为乡镇企业。正是这些历来被人们歧视的乡镇企业的巨大发展,才填补了中国国有企业 50% 的亏损面,促成 10% 以上的连续高增长。可见,读不懂农民,是读不懂中国经济奇迹的。

当我们将视线再向历史的隧道远处望去,又会发现,震撼神州大地的人民公社是从农民开始的,满天通红的“大跃进”之火又是从农民那里首先燃起的。解放初期的两件大事——农业合作化与土改,也是农民的事。再向前推去,解放战争、抗日战争、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农村包围城市,又均以农民为主体。

由此观之,中国的无论哪一件、哪一桩风云大事均离不开“农民”这个“源头活水”。故以《读不懂农民 读不懂中国》命名本书,窃以为颇合中国国情。

笔者此书写了 4 年,也学习了 4 年,当写完本书之后,越觉得农民问题之深奥、之有趣,深感它在中国问题中的重要。故将后记改为序,以便先将自己的感受告诉读者,但后记不能写在前面,于是别出心裁地改序为“辨代序”。请读者见谅。